

《盐铁论》与中国古代战略文化^{*}

朱中博 汪 宁

“一代人以前，中国问题分析家们一般都认为，20世纪初，可供中国领导人使用的战略思想是很有限的。……最近，学术界最重要的发现是，传统的中国战略思想比以前的解释要丰富得多。……儒家不是一种铁板一块的思维体系。加上法家和道家的思想以后，中国的知识传统非常丰富多样。”

“20世纪中后期特别是90年代以来，在国内外学者中出现了研究中国战略文化的热潮。这种热潮的一个重要背景就是，中国逐渐由地区性大国向世界性大国迈进，中国的崛起是否会对世界和平构成威胁这个问题越来越引人注目，人们希望从中国战略文化传统中寻找答案。……中国近代以前所奉行的基本战略文化是什么？这些战略文化是如何产生的？它对中国的战略行为

*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研究院钱皓教授、汪伟民副教授、韦宗友副教授、马骏博士及胡礼忠教授的耐心鼓励和悉心指导；《国际政治科学》约请的匿名评审专家也给予了无私鼓励和细致帮助；笔者在此向他们一并致谢，但一切文责由本人自负。此外，本研究还得到了“上海外国语大学第二届研究生科研基金项目”的资助。

迈克尔·奥克森伯格：《中国：走向世界舞台的曲折之路》，参见罗伯特·帕斯特编：《世纪之旅：七大国百年外交风云》（胡利平、杨韵琴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21—323页。

《国际政治科学》2007/4（总第12期），第85—103页。

Quarterly Journal of Intentional Politics

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之所以引用上面的两段话，是因为笔者一向认为中国的战略思想资源是丰富的，这一点在《盐铁论》这部“空前绝后的奇书”中有突出和集中的体现，这部书展示了中国战略思想资源丰富的一面并具体揭示出中国古代战略思想的一些内在的本质。

《盐铁论》成书于西汉宣帝年间，是当时的庐江太守丞桓宽对汉昭帝始元六年（即公元前81年）发生的一场为期两天的政策大辩论所做的会议记录。这场辩论在当时的中央卿大夫（以御史大夫桑弘羊为代表）和从各地征召来的60余位贤良文学之间进行，主要就自汉武帝元狩四年起因对匈奴用兵而实行的盐铁官营、酒榷、均输和平准政策的废除问题而展开。虽然会议争论的焦点在于是否应该废除这些经济政策，但它也深刻地触及到当时的对外战略问题。会议第一天的辩论是因对匈奴用兵而采取的经济政策的存废而发，会议第二天的中心议题更是对匈奴的继续用兵问题，辩论中广泛涉及到了对匈奴、东胡、朝鲜、南越、西南夷、西域的政策及与此相关的王霸之辨、德力之辨等中国古代一系列对外思想的主要内容，因此，关于对外战略的辩论便成为了这场会议及该书的重中之重（参见表—1）。

李少军：《国际战略报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20页。

乔清举：《盐铁论全文注释本》，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前言部分。下引《盐铁论》均出自该书及国学整理社：《诸子集成》（第七卷），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版；马非百：《盐铁论简注》，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王宁：《评析本诸子白话集成》（下），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

表 - 1 《盐铁论》中外交思想所占比重统计

未直接以外交相关文字作标题、但直接涉及外交的章节包括	首日辩论	本议第一 非鞅第七 国疾二八	力耕第二 轻重十四 执务三九	通有第三 未通十五 能言四十	复古第六 利议二七 取下四一
	次日辩论	诛秦四四	世务四七 论灾五四	繇役四九 杂论六十	论邹五三
直接以外交相关文字作标题的章节包括	首日辩论	忧边十二	地广十六	崇礼三七	备胡三八
	次日辩论	击之四二 和亲四八	结合四三 险固五十	伐功四五 论勇五一	西域四六 论功五二

注：两类章节合起来共 30 篇，占全书的 50%，其中次日的辩论所涉及的外交章节为 13 篇（《杂论六十》除外），占当天会议的几乎 80% 的比重。

这次论战中的主要人物或为精明干练的中央政府官员，或是忧国忧民的地方饱学之士，他们的对外战略思想既有对他们所在时代之前外交思想的浓缩、反思与鉴用，也深深扎根于当时的时代大背景之中。因此，他们的对外战略思想很可能“包括了国际政治的本质和它的形式，而这个国际政治的本质和形式”正如某些论者所指出的那样在今天可能依然是“惊人地未变。”

《盐铁论》中的对外战略思想大体可分为以下三个层次，即：中国处于主动进攻、被动防御以及非攻非守这三种不同军事态势时可选取的不同战略。

一、主动进攻态势时的对外战略抉择

这样的态势是指中国处于绝对的军事优势，周边的四夷对中国无强大的攻击能力或不能构成强大的威胁，一如当时汉王朝与南越、西南夷、东胡、朝鲜、西域等国之间的力量对比态势。对于这一态势下所应采取的对外战略，卿大夫和贤良文学有着截然不同的主张。

卿大夫认为，当处于可以发动主动进攻的军事强势地位时，中国应抓住

叶自成：《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中国视野》，《外交评论》2005年第3期，第65页。

时机，积极以武力扩大国家的疆域。其观点可以归结为“以武力谋求扩张”——“任武可以辟地”。他们这种主张的逻辑和理由如下：

1. 武力扩张容易获益并能惠及后世

卿大夫认为，“先帝计外国之利，料胡、越之兵，兵敌弱而易制，用力少而功大，故因势变以主四夷，地滨山海以属长城，北略河外，开路匈奴之乡”。在他们看来，既然四夷“兵敌弱而易制”，则武力扩张必然“用力少而功大”，因而极易成功和获益。

而从历史先例来看，外扩对后世也有很大的利益：“伯翳之始封秦，地为七十里。穆公开霸业，孝公广业。自卑至上，自小至大。故先祖基之，子孙成之……故手足之勤，腹肠之养也。当世之务，后世之利也。”

如果这仅表述了武功的抽象收益的话，那么，卿大夫在以下则继续陈述他们对武力外扩具体收益的评估。

2 对具体收益的评估结果

卿大夫认为，外扩前“内郡人众，水泉荐草不能相瞻，地势温湿，不宜牛马。民蹠耒而耕，负檐而行，地罢而寡功。是以百姓贫苦而衣食不足，老弱负轭于路，而列卿大夫或乘牛车。”而外扩后，中国以百越为园圃、羌胡之地为园囿，“珍怪异物充于后宫，騊駼、馱馱实于外厩，匹夫莫不乘坚良，而民间或厌橘柚。”“长城以南，滨塞之郡，马牛放纵，蓄积布野”。也就是说，对外扩张对于国计民生有着很大的利益。

由此，无论是从收益的难易还是从具体的回报来看，武力外扩的取向似乎均可证明是合理的。尽管卿大夫也说“圣主斥地，非私其利；用兵，非徒愤怒也。匡难避害，以为黎民远虑。”但透过这些言论的伪装，我们依然可

《盐铁论·杂论第六》。这样的主张颇类似于司马错伐蜀时对秦王的进言，司马错当时说“臣闻之，欲富国者务广其地……”，参见《战国策·司马错论伐蜀》。

《盐铁论·复古第六》。

《盐铁论·结合第四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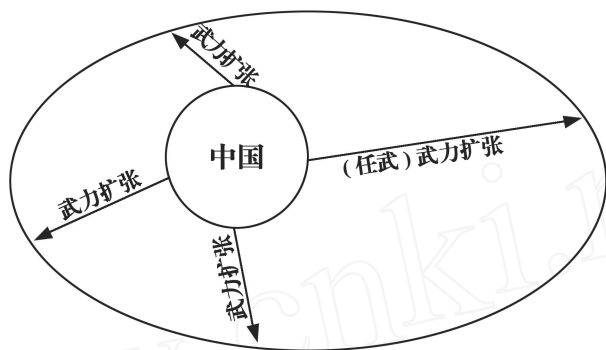
《盐铁论·未通第十五》。

同上。

《盐铁论·西域第四十六》。

同上。

以看到其本质主张是，试图挟强盛国势“斥地广边”，实行武力的外扩。这种扩张由于是一种武力的单纯由内向外扩张，因此，它的扩张趋势表现为单一方向的向外推衍，即单向度形式。概括之，卿大夫此态势下的对外战略取向即可表述为“任武”（武力外扩）的单向度外向放大模型，如图—1：



图—1 “任武”的单向度外向放大模型

与卿大夫的武力扩张论相对，贤良文学则提出“德广可以附远”，主张通过完善文德以及由此产生的感召力使“近者亲附，远者悦德”，从而对卿大夫的武力扩张论予以驳斥，认为武力扩张并不能产生实质的收益，反而蕴含着巨大危险。其理由如下：

1. 利益的评估

贤良文学认为：“边郡山居谷处，阴阳不和，寒冬裂地，冲风飘鹵，沙石凝积，地势无所宜。中国，天地之中，阴阳之际也；日月经其南，斗极出其北。含众和之气，产育庶物。今去而侵边，多斥不毛苦寒之地，是尤弃江皋河滨，而田于岭坂菑泽也。”在他们看来，外扩之地并非实际的可收益之

《盐铁论·杂论第六十》。

同上。

《盐铁论·轻重第十四》。

地，中国不可能指望从那里获得任何回报。

他更进一步论证，不仅无法得到任何直接的回报，相反以武力外扩还会带来巨大的国内负担。

2 国内负担

贤良文学指出，未伐胡、越之时，“繇赋省而民富足，温衣饱食，藏新食陈，布帛充用，牛马成群。农夫以马耕载，而民莫不骑乘；当此之时，却走马以粪。”而师旅数发之后，“戎马不足，牝牡入阵，故驹犊生于战地。六畜不育于家，五谷不殖于野，民不足于糟糠”

为了支持战争，国内百姓不得不承担各种繁重的徭役负担：“繇役极远，尽寒苦之地，危难之处，涉胡、越之域，今兹往而来岁旋，父母延颈而西望，男女怨旷而相思，身在东楚，志在西河，故一人行而乡曲恨，一人死而万人悲。”“兴师而伐之，屯戍而备之，暴兵露师，以支久长，转输粮食无已，使边境之士饥寒于外，百姓劳苦于内。”

贤良文学认为，国内负担的加重会引起各种后果，而最严重的后果从历史上看往往可能是国家的内溃，即百姓发生暴动，王朝覆灭，国家四分五裂。

3 内溃之可能性

“秦南禽劲越，北却强胡，竭中国以役四夷，人罢极而主不恤，国内溃而上不知；是以一夫倡而天下和，兵破陈涉，地夺诸侯……诗云：‘雍雍鸣鹄，旭日始旦。’登得前利，不念后咎。故吴王知伐齐之便，不知干遂之患。秦知进取之利，而不知鸿门之难。是知一而不知十也。”他们以秦代及先秦历史上武力外扩而导致国家崩溃、政权解体的教训，清楚地表明了内溃这种

对于贤良文学的这种主张，葛剑雄先生认为，在以农立国的古代中国，中原王朝对自己疆域的要求标准在于是否适宜农耕、是否能养活百姓。在当时的物质条件下，“边郡之地”或者面积太小，无法养活大量人口；或者条件太差，生产成本和代价太高；或者在当时就根本无法开垦，因此对于中原王朝来说，占领这样的土地事实上意味着负担的增加。见葛剑雄：《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4年版，第 107—108页。

《盐铁论·未通第十五》。

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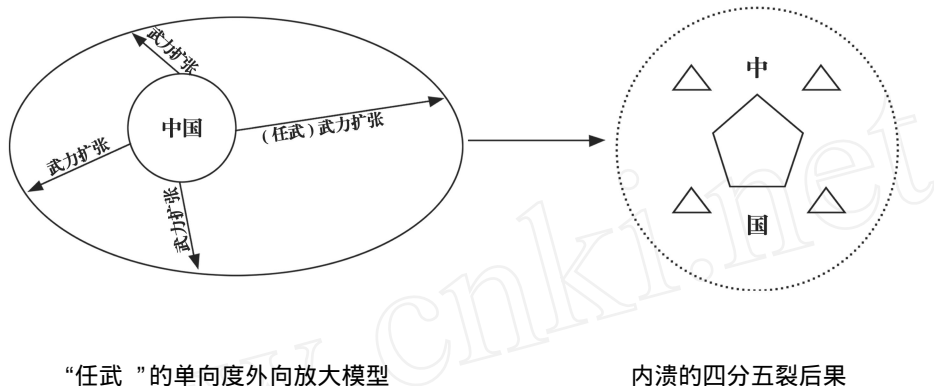
《盐铁论·执务第三十九》。

《盐铁论·本议第一》。

《盐铁论·结合第四十三》。

情况发生的可能性。

贤良文学这种“武力外扩——无收益且造成国内负担——内溃”的观点，事实上是对卿大夫“任武”的单向度外向放大模型的后果补充（见图—2）。



图—2 武力外扩的后果补充

在驳斥了武力扩张论之后，贤良文学接着论述他们的主张及其背后的逻辑。他们认为，四夷之地根本无需烦劳中国去使用武力，所谓“不牧之地，不羁之民，圣王不加兵，不事力焉，以为不足烦百姓而劳中国也。”只要“诚信着乎天下，醇德流乎四海，则近者哥讴而乐之，远者执禽而朝之。”在他们看来，德的感召力量是巨大的，“春秋‘王者无敌。’言其仁厚，其德美，天下宾服，莫敢交也。德行延及方外，舟车所臻，足迹所及，莫不被泽。蛮、貊异国，重译自至。”因此，只要注重德行之完善及运用，就可以使四夷向化而不召自至，像被磁场吸附一样，自求归附中国。这样的归附，笔者以为对中国来说事实上也隐含着扩张的结果，尽管“附远”与“辟地”的含

而当时事实上也的确出现了贤良文学所说的这种局面，故汉武帝后来在和卫青的一次谈话中说：“若后世有如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也。”语见《资治通鉴》卷二十二。

《盐铁论·论功第五十二》。

《盐铁论·世务第四十七》。

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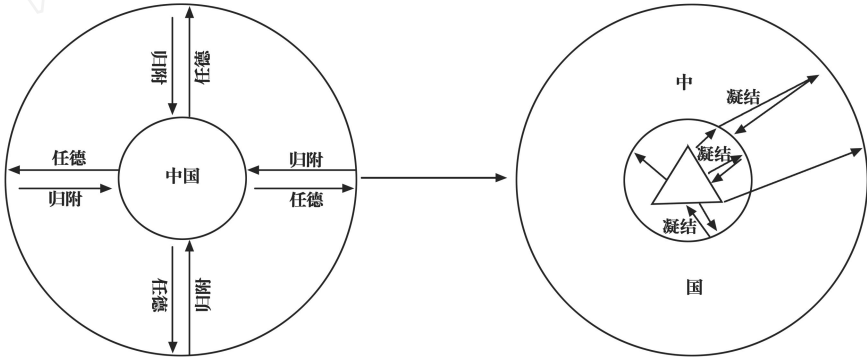
义存有差别，但他们其实都有着一一种“使外夷归属中国”的意义在其中。因此，贤良文学的主张，实质可以说是造成了一种不自觉的磁场力般吸附型的扩张。这种不自觉的磁场力般吸附型的“任德”扩张，从理论上说，由于四夷多为受感召而自化来附，当其与中国融合之后，这种“外扩”的结果与武力外扩相比，其优点在于，由此产生的结果更为巩固，并且不易反复，不会在这些地区出现叛乱不断的局面，使“扩张”后的中国有着更坚实的凝结对力。

贤良文学的这一逻辑可表述如下：

德之完善及感召 —— 四夷来附 —— 国家疆域之扩张且凝结对力强（扩张之不自觉完成）

这种与“任武可以辟地”相对的“德广可以附远”的主张，事实上其本质是以“任德”作“任武”的替代，而不是对“辟地”的放弃。因此，“德广可以附远”的内在寓意其实就是“德广可以辟地”。由于在这个扩张过程之中，既有中国德力的向外感召过程，又有四夷受感召的来附过程，因此相比于武力的单向度外向放大，它表现出了一种双向度的特点。

贤良文学的这种对外战略及其理论结果，可以用图—3来概括表示：



双向度磁场式吸附型“任德”扩张模型

更为巩固和不易反复的扩张结果

图—3 “任德”扩张模型及其结果

二、防御态势时的对外战略取向

所谓的防御态势是指中国在境外有强大敌人存在，而不得不在战略上处于被动防守的态势。这种态势尤其体现在汉与匈奴的关系之中。当然，被动的防御态势并不意味着中国永远处于守势，它只是面对强敌时的一种初期表现，而在其后则会有动态的变化。

对于这一态势下的对外战略选择，卿大夫和贤良文学也有着不同的主张。

卿大夫认为此时必须以积极的武力姿态应对，并以三个不同的战争阶段来进行：

1. 以武止武 \ 武力防御

卿大夫认为对于敌人的攻击必须做武力的防御，即以武止武，这是强国固本、基本自卫的必需：“诗云：‘狻猊孔炽，我是用戒。’‘武夫潢潢，经营四方。’故守御征伐，所由来久矣。春秋犬戎未至而豫御之。故四支强而躬体固，华叶茂而本根据。”

当情势发生变化之时，中国应当适时地对外主动发起攻击，打击敌人，即以武攻武。

2 以武攻武 \ 武力打击

卿大夫认为这是国家安全的必需：“兴师推却胡、越，远寇安灾，散中国肥饶之余，以调边境。边境强，则中国安，中国安则晏然无事。”

同时，这也是名正言顺的“仁人”之举：“鄙语曰：‘贤者容不辱。’以世俗言之，乡曲有桀，人尚辟之。今明天子在上，匈奴公为寇，侵扰边境，是仁义犯而藜藿不采。昔狄人侵太王，匡人畏孔子，故不仁者，仁之贼也。是以县官厉武以讨不义。”

之所以要采取武力的措施，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外夷不可感化，故不得不击之：“汉兴以来，修好结和亲，所聘遗单于者甚厚；然不纪重质厚赂

《盐铁论·繇役第四十九》。

《盐铁论·地广第十六》。

《盐铁论·备胡第三十八》。

之故改节，而暴害滋甚”。虽然汉朝对匈奴采取了和亲之策，给予了巨大的物资上的好处，匈奴侵扰汉朝边关的行为并无收敛。因此，卿大夫认为匈奴“可以武折，而不可以德怀”，所谓“屠者解分中理，可横以手而离也；至其抽筋凿骨，非行金斧不能决。圣主循性而化，有不从者，亦将举兵而征之，是以汤诛葛伯，文王诛犬夷。及后戎、狄猾夏，中国不宁，周宣王、仲山甫式遏寇虐。诗云：‘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出车彭彭，城彼朔方。’自古明王不能无征伐而服不义”。总而言之，只讲文德，而没有武力为基础是不行的。

卿大夫的这一主张的背后，也许还有树立国家威信的思考、摆脱国家屈辱的情感在起作用：“匈奴以虚名市于汉，而实不从；数为蛮、貊所给，不痛之，何故也？高皇帝仗剑定九州；今以九州而不行于匈奴。闾里常民，尚有泉散，况万里之主与小国之匈奴乎？夫以天下之力勤何不摧？以天下之士民何不服？今有帝名，而威不信于长城之外，反赂遗而尚踞敖，此五帝所不忍，三王所毕怒也。”

3 以武灭武 \ 武力消灭

上述两个阶段成功完成之后，一旦可以进入战略上的完全反击，卿大夫们以为，此时便当乘胜利之威，“以武灭武”，彻底歼灭敌人。其主要的担心在于纵虎为患，功亏一篑，即，半途而废必然使先前之功“毁于一旦”：“匈奴壤界兽圈，孤弱无与，此困亡之时也。辽远不遂，使得复喘息，休养士马，负给西域。西域迫近胡寇，沮心内解，必为巨患。”“初，贰师不克宛而还也，议者欲使人主不遂忿，则西域皆瓦解而附于胡，胡得众国而益强。先帝绝奇听，行武威，还袭宛，宛举国以降，效其器物，致其宝马。乌孙之属骇胆，请为臣妾。匈奴失魄，奔走遁逃，虽未服，远处寒苦磽确之地，壮者死于祁连、天山，其孤未复。故群臣议以为匈奴困于汉兵，折翅伤翼，可遂

《盐铁论·结合第四十三》。

同上。

《盐铁论·繇役第四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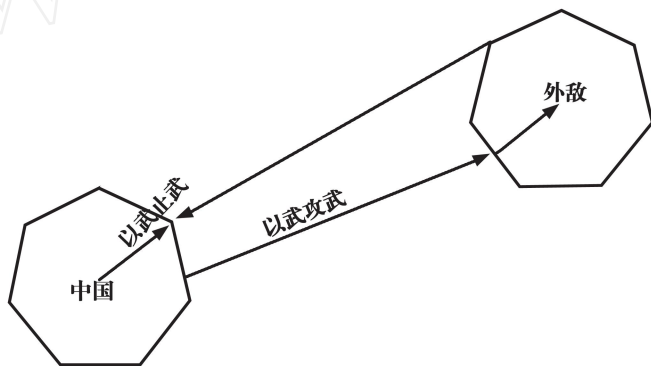
同上。

《盐铁论·击之第四十二》。

击服。会先帝弃群臣，以故匈奴不革。譬如为山，未成一篑而止，度功业而无继成之理，是弃与胡而资强敌也。”不趁对方衰弱之机给予强有力的打击，其结果是坐等对方的强大，而使自己处于被动的局面。

针对贤良文学的继续打击外敌会造成“百姓疾罢”的忧虑，卿大夫以为，依然当再作坚持，而不可半途辍废，并援史例论述之：“昔夏后底洪水之灾，百姓孔勤，罢于笼缶，及至其后，咸享其功。先帝之时，郡国颇烦于戎事，然亦宽三陲之役。语曰：‘见机不遂者陨功。’一日违敌，累世为患。休劳用供，因弊乘时。帝王之道，圣贤之所不能失也。功业有绪，恶劳而不卒，犹耕者倦休而困止也。夫事辍者无功，耕怠者无获也。”

概述之，在此种态势下，卿大夫的选择为：（1）以武止武（武力防御）；（2）以武攻武（武力打击）；（3）以武灭武（武力消灭）的“三步走”战略。而由以武止武至以武攻武和以武灭武，这种战略表现为一种敌我间军事互动的双向度模型，即承受住敌人的攻势后，反击并击溃和完全消灭敌人，这可以通过图—4来表示：



图—4以武止武、攻武、灭武的双向度模型

《盐铁论·西域第四十六》。

《盐铁论·西域第四十六》。

需要注意的是，以武灭武其实最终亦可以达到“以武力外扩”的目的，而与“任武”的单向度外向放大模型相部分地重合。

贤良文学在这一问题上则认为，对于外来之侵略，根本无需“武折”，而只要以“德怀之”，一切问题就可“迎刃而解”。他们的这种战略与卿大夫的战略相对应，同样要由“三步走”来完成：

1. 以德止武 化解敌人的进攻

他们首先从哲学的高度论证对来犯之敌不应当使用武力：“兵者，凶器也。甲坚兵利，为天下殃。以母制子，故能久长。”

主张对敌人应施以道德的防御：“畜仁义以风之，广德行以怀之。是以近者亲附而远者悦服。故善克者不战，善战者不师，善师者不阵。修之于庙堂，而折冲还师。”只要在国内修文德、行仁政，就可以击退敌人的军队了，根本不需要动用武力。

2. 以德息武 去敌进攻中国之心

在对敌以道德的防御而化解其武力攻击之后，贤良文学认为，从历史的经验看，继续运用道德的手段，能够进一步去除外敌的来犯之心，使其从根本上不再存在进犯的欲念：“诚上观三王之所以昌，下论秦之所以亡，中述齐桓所以兴，去武行文，废力尚德，罢关梁，除障塞，以仁义导之，则北垂无寇虏之忧，中国无干戈之事矣。”“诗云：‘酌彼行潦，挹彼注兹。’故公刘处戎、狄，戎、狄化之。太王去豳，豳民随之。周公修德，而越裳氏来。其从善如影响。为政务以德亲近，何忧于彼之不改？”

3. 以德化武 化敌而使之来朝归顺

如果能够继续运用和推行道德，不仅能够去除外敌的来犯之心，最终还可达致使外敌完全受感化而来朝中国：“夫蛮貊之人，不食之地，何足以烦虑，而有战国之忧哉？若陛下不弃，加之以德，施之以惠，北夷必内向，款塞自至，然后以为胡制于外臣，即匈奴没齿不食其所用矣。”“诗云：‘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故‘自彼氏、羌，莫不来王。’非畏其威，畏其德也。故

《盐铁论·忧边第十二》。

《盐铁论·本议第一》。

《盐铁论·世务第四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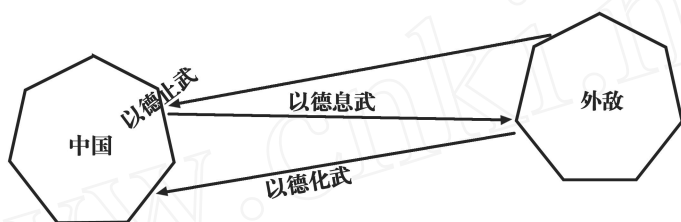
同上。

《盐铁论·论灾第五十四》。

义之服无义，疾于原马良弓；以之召远，疾于驰传重驿。”

在贤良文学看来，其最终去敌的效果远远超出武力的直接歼灭。

总而言之，这种以德止武、息武、化武的战略理论认为根本不必使用武力来对付外敌，而只需推行道德便可化解掉他们的进攻及来犯的欲望，使之最终来朝归顺。他们的主张相对于卿大夫与敌的双向度互动模型来说，存在着一种三向度的特点，即以德止武后，再以德行施之于敌人，使之受感化而放弃再攻中国的欲望，并最终归顺于中国，从而比卿大夫的主张多出了一个向度的互动，这可以用图—5来表示：



图—5 以德止武、息武和化武的三向度模型

三、非攻非守态势时的对外战略选择

非攻非守的态势，是指一般的和平常态时期。对于在这一态势下所应采取的战略，卿大夫与贤良文学依然未能有一致的意见。

卿大夫以为，应保有常态的军备和险固的城池，外敌才不敢来犯，国家才可以无忧。所谓“虎兕所以能执熊羆、服群兽者，爪牙利而攫便也。秦所以超诸侯、吞天下、并敌国者，险阻固而势居然也。故龟狷有介，狐貉不能禽；蝮蛇有螫，人忌而不轻。故有备则制人，无备则制于人。”以哲学意义

《盐铁论·论勇第五十一》。

这样的主张事实上是与双向度磁场式吸附型“任德”扩张模型的精神是相一致的。

《盐铁论·险固第五十》。

上的类比来阐释国防的必要。

稳固的国防，具体的则需要有险阻与城池：“为国必察土地、山陵阻险、天时地利，然后可以王霸。故制地城郭，饬沟垒，以御寇固国。春秋曰：‘冬浚洙。’修地利也。三军顺天时，以实击虚，然困于阻险，敌于金城。”

而历史则表明国防以阻险为手段是绝对必要的：“楚自巫山起方城，属巫、黔中，设扞关以拒秦。秦包商、洛、崤、函，以御诸侯。韩阻宜阳、伊阙，要成皋、太行，以安周、郑。魏滨洛筑城、阻山带河，以保晋国。赵结飞狐、句注、孟门，以存邢代。燕塞碣石，绝邪谷，绕援辽。齐抚阿、甄，关荣、历，倚太山，负海、河。关梁者，邦国之固，而山川者，社稷之宝也。徐人灭舒，春秋谓之‘取’，恶其无备，得物之易也。故恤来兵，仁伤刑。君子为国，必有不可犯之难。易曰：‘重门击拓，以待暴客。’言备之素修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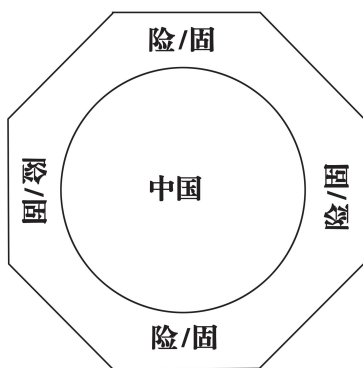
除此之外，国防还应当以坚甲利兵为必要的支撑：“荆轲怀数年之谋而事不就者，尺八匕首不足恃也。秦王惮于不意，列断赅、育者，介七尺之利也。使专诸空拳，不免于为禽；要离无水，不能遂其功。世言强楚劲郑，有犀兕之甲，棠溪之铤也。内据金城，外任利兵，是以威行诸夏，强服敌国。故孟贲奋臂，众人轻之；怯夫有备，其气自倍。况以吴、楚之士，舞利剑，蹶强弩，以与貉虎骋于中原？一人当百，不足道也！夫如此，则貉无交兵，力不支汉，其势必降。”

这种对外战略，以险要山河、坚城、坚甲利兵等有形的地利（险固）和武备为依托，做常态的国防，笔者将之归述为“有形的阻险”，可以用图—6来表示：

《盐铁论·险固第五十》。

同上。

《盐铁论·论勇第五十一》。



图—6 有形的阻险模型

贤良文学以为卿大夫所说的阻险其实并无必要。他们认为，国防以阻险为手段是一种狭小心态的反映或者说只是国防的“末”途而已，真正的国防根本在于德义的推广和宣扬：“阻险不如阻义，昔汤以七十里为政于天下，舒以百里亡于敌国。此其所以见恶也。使关梁足恃，六国不兼于秦；河山足保，秦不亡于楚、汉。由此观之：冲隆不足为强，高城不足为固。行善则昌，行恶则亡。”

他们认为，历史上单纯依恃险阻的结果往往都是灾难性的：“秦左殽、函，右陇坻，前蜀汉，后山河，四塞以为固，金城千里，良将勇士，设利器而守陁隧，墨子守云梯之械也。以为虽汤、武复生，蚩尤复起，不轻攻也。然戍卒陈胜无将帅之任，师旅之众，奋空拳而破百万之师，无墙篱之难。”

所以真正的国防“在德不在固”：“所谓金城者，非谓筑壤而高土，凿地而深池也。所谓利兵者，非谓吴、越之铤，干将之剑也。言以道德为城，以仁义为郭，莫之敢攻，莫之敢入。文王是也。以道德为冑，以仁义为剑，莫之敢当，莫之敢御。”“以仁义为阻，道德为塞，贤人为兵，圣人为守，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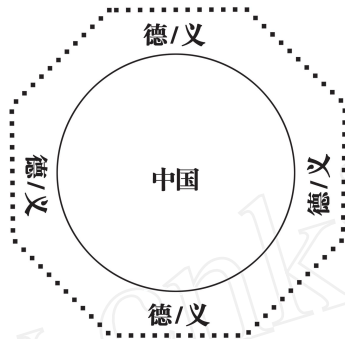
《盐铁论·险固第五十》。

同上。

《盐铁论·论勇第五十一》。

莫能入。如此则中国无狗吠之警，而边境无鹿骇狼顾之忧矣。”

概述之，即贤良文学认为：国防者，险固为末，德义为本。他们主张以无形的（德）义为手段，通过阻（德）义使内外悦服，来完成国防。模型表述之即：



图—7 无形的阻义模型

四、结 语

把上面在三种不同军事态势下分别具有的两种不同的战略选择及其逻辑支撑综合起来，就构成了一幅相对完整的中国战略选择思想框架图。

《盐铁论·险固第五十》。

贤良文学的此种主张与战国时代吴起对魏武侯所言国家之宝“在德不在险”颇为类似。参见《史记卷·孙子吴起列传》。

这样一幅战略选择思想框架图，近似于“王道与霸道”的中国战略文化的传统两分法；也近似于江忆恩对中国的战略文化的两分法：“一种源自孔孟的范式，在其战略选择顺序中，非暴力的、妥协性的大战略被放在暴力防御或进攻战略的前面。另一种战略偏好则来自强硬的实力政治，它一般将进攻性战略置于静态防御与妥协性战略之前。”国内有的学者如陈向阳则持三分法，认为中国战略文化应包括纯粹王道、务实王道和纯粹霸道三种。笔者以为这种三分法在实质上与上述的两分法近似，所不同的是，三分法将传统上“霸道”与“王霸并用”的模糊化等同做了一次清晰化隔离。见陈向阳：《中国睦邻外交：思想·实践·前瞻》，北京，时事出版社2003年版，第54—55页及第77—79页。

尽管卿大夫与贤良文学在不同军事态势下的战略取向都几乎“分道扬镳”，但事实上他们并非属于相异的学术流派。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西汉卿相几乎皆出自儒家“布衣”。在为期两天的大辩论中，倾向于使用武力的卿大夫事实上前后都曾多次引用儒家经典为自己的主张进行辩护。

卿大夫与贤良文学的对外战略之争，颇类似于晚清时代洋务派与守旧派之间的论争，其争吵更多地是一种源于职位不同所导致的见识不同，而非学理渊源上的分野。“纵观中国历史……儒家思想有两种不同的形态，一是官方意识形态的儒家文化，另一个是理念形态的儒家文化。”卿大夫的观点更多地体现着官方意识形态的儒家文化，在践行其职责时往往倾向于武力与威慑的使用；而贤良文学则代表后者，执守着儒家理念的纯洁性使命并在现实的关怀中对国内百姓的疾苦保持着密切的关心，由此在几乎所有态势下，首要考虑的基本上都是国内政治秩序的稳定。卿大夫的战略取向在实际中切实创造着中国历史上对外关系最辉煌和国家对外安全最有保障的时代，而贤良文学的主张则小心地使这种辉煌与安全时代存在的基础可以得到保障。前者的理念在中国国家实力最强大并在强势领导者统治（如汉唐时代几位帝王）之下得到实施和弘扬，而后者的理念则盛行于中国古代历史中的大部分

“文化大革命”时期，曾有人将贤良文学与卿大夫的争论视为儒法之争，并对被认为是儒家代表的贤良文学的观点大加挞伐；“文化大革命”之后，学者们大都抛弃了这一看法。参见蒋兆成：《揭穿“四人帮”影射史学的极右实质：剖析梁效黑文 读盐铁论》，《杭州大学学报》1978年第2期。

曹泳鑫：《和平主义：中国和平崛起的思想资源和理论准备》，上海，学林出版社 2005年版，第 83页。

陈向阳认为，卿大夫的观点为“务实王道”，“既强调道义，又注重实力与功利”；而贤良文学则代表着纯粹王道，“它完全排斥权力与功利因素，只强调仁义道德”。笔者以为，二者的主张事实上都带有务实和讲求实利的色彩，只是考虑问题的侧重点及实现的手段各有不同。但是，卿大夫在考虑战争的荣耀与功利时，对道义并未有适当地强调或不过偶尔以之做掩饰而已，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卿大夫的主张接近于“纯粹霸道”，而非陈向阳所说的“务实王道”；贤良文学担忧过度战争对民生与国内政治的灾难性后果（民生与国内政治的稳定亦是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由此倾向于德力的使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其主张接近于“纯粹王道”，但并非像陈向阳所说的“纯粹王道……特点是唯心性、理想性、主观性、机械性、绝对性、片面性与一厢情愿性。”或者说，二者的观点中其实都有霸道的成份，只是前者多一些，而后者少一些而已。参考陈向阳：《中国睦邻外交：思想·实践·前瞻》，第 61—65页及第 78页。

时期，并在与前者的理念对抗中始终处于理论和道德上的优势地位，即使有时后者的主张可能显得迂阔难行。在这场辩论之后，当时的西汉政府（以汉昭帝为代表的政府最高决策层）最终选择了“深知百姓疾苦”的地方贤良文学的战略主张。

而在自西汉之后 2000 余年的中国历史中，每当面临外交战略的大抉择时，我们依然可以看到这三对模型的影响力，他们所代表的两种战略思想总是被交互使用。从唐代对突厥的恩威并用战略及当时朝鲜、日本对中国德义的向化，到明王朝对外战略中对蒙元残余势力不断实行的武力打击和招抚的“两手并用”政策，及对朝鲜、越南、琉球等周边政治实体的德义相召以及郑和下西洋宣示中国德义的行为，无不体现着二者交互使用的特征。尽管如此，在大多数时期里，贤良文学的主张还是有着更强的影响力，“中国历朝统治者都以传统儒家道德教化向外远播道德光环，即便对胆敢冒犯者施以武力威胁之后，也总是以道德教化开导告诫。”鉴于贤良文学的战略主张把国家内部稳定置于首要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来说，王朝统治者对这种战略的采用，避免了国家向外扩张耗费大量国力，从而使国家秩序的稳定得以保持。值得思考的是，任何明确违背贤良文学的战略主张的时代如秦、隋两代均发生了如贤良文学所料想的国家内溃，并成为这些盛极一时的王朝速亡的最重要原因。这些不断重复的历史教训似乎证明了贤良文学战略主张的真理性，贤良文学的战略主张也由此更多地被后世帝王和王朝的中央官僚以及知识分子精英秉信为至理。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外交历程中，这两种战略文化的影响力并没有消失。在新中国处于可进攻态势的环境下，如与周边小国包括与中国有领海争端的

明代这两种战略并用的事例还表现在明太祖朱元璋在《皇明祖训》中对其后世子孙的申诫：“四方诸夷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不揣量，来挠我边，则彼为不祥；彼即不为中国，而我兴兵轻伐，亦不祥也。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致伤人命，切记不可，但胡戎与西北边境互相密迩，累世战争，必选将练兵，时谨备之。”转引自曹泳鑫：《和平主义：中国和平崛起的思想资源和理论准备》，第 79 页。

曹泳鑫：《和平主义：中国和平崛起的思想资源和理论准备》，第 78—79 页。

叶自成等：《地缘政治与中国外交》，北京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91—193 页及第 206—207 页。

东南亚国家及与亚非拉等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中，我们都可以看到第一种军事态势下贤良文学战略主张的表现。20世纪50年代末与60年代初在新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边界划定，以及新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对东南亚国家在领海争端方面的让步清晰地体现了这一点。而在应对美苏等强势敌人时，卿大夫在此种态势下的主张则体现得似乎更为明显，在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以及珍宝岛冲突等一系列事件中为毛泽东等新中国的第一代领导人所践行。当然，这样的践行主要体现在以武止武阶段，并不意味着中国在将来会僵化地按照这一态势下卿大夫所主张的后两个步骤对与中国有冲突可能的大国实施以武攻武和以武灭武。而在非攻非守的国防常态下，这两种战略的交互使用也表现得比较突出，在中国适度稳步提高国防军事预算、加快国防现代化步伐的同时，中国政府业已开始在全球范围内提升中国的软权力，有形的阻险与无形的阻义模型在新的时代下以新的形式被践行着。

作者简介

李莉 印度尼赫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候选人。1991和2002年在国际关系学院先后获学士和硕士学位。1991—2003年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从事中东政治和美国外交研究。代表作有“China's Constitutional Amendment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China Report* (Sage Publications), No. 1, Vol. 41, 2005。

电子信箱: jasm ineli3@ yahoo. com

宋国友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讲师。2003和2006年在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先后获硕士和博士学位。在《世界经济与政治》、《现代国际关系》、《战略与管理》等学术刊物发表论文十余篇。

电子邮箱: guoyousong@ fudan. edu. cn

何帆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助理。1993年在海南大学获国际贸易专业学士学位, 1996和2000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先后获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1998—2000年在哈佛大学进修。著有:《失衡之困》(2007年)、《寻找内外平衡的发展战略》(2007年)。

电子信箱 hefancass@ gmail. com

唐岳华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2006年在南开大学获经济学学士学位。

电子信箱: yuehuatang@ gmail. com

朱中博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研究院硕士研究生。2005年在山西大同大学获历史学学士学位。

电子信箱: chestnut7766@ yahoo. com. cn

汪宁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72和1989年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先后获俄罗斯语言文学学士、社会学硕士学位, 2002年在华东师范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1996—1997年在俄罗斯莫斯科大学做访问学者。著有:《俄罗斯私有化评说》(2001年)、《普京的俄罗斯“新”思想》(2005年)。

电子信箱: wangn@ shisu. edu. cn

林民旺 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博士候选人。2003年在中南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 2005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法学硕士学位。译有:《战略经济学》(2006年)。

电子邮件: lmm inwang991@ 126. com